

拜访梁家河和白家塬

张时钊

知青，是指上世纪 60 年代上山下乡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青年学生。虽然，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再教育，在劳动中改造思想，一解放就提出来的，但大规模组织知识分子到农村去，大概应该是反右之后的那一次。当时我在西北农学院读大一，第一批下乡劳动锻炼。我校 30 多名师生，下放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乡，我和另两位同班同学，牛尔卓和张玉书，被分配到白家塬村，从 1957 年 11 月到次年 6 月，共 8 个月。参加这次锻炼的我班同学，四、五年前就曾想结伴再去陕北拜访老乡，可惜没有成行。

我们国家现主席习近平，他当年插队当知青 7 年的梁家河，也属文安驿。2018 年，《梁家河》出版，我看了之后，想去参观一下。白家塬和梁家河既在同一个乡，应该相距不远，但是手头的陕西省地图都没有这两个地名，查网上地图，大概相距 30 里左右。实际上是相邻的两个行政村。我年纪大了，再拖下去，可能以后就去不了了，即使没有同伴，我一个人也要去。梁家河，因而文安驿已经那么有名，我立即给文安驿乡写了封信，他们打电话告诉我白家塬现书记樊志利的电话，樊书记则用短信告诉我：现在白家塬年龄最大的叫白凤乐，已 88 岁，还记着我，又告诉我当过 50 年村领导的刘汉民的电话。第一个名字我记起来了，但是说刘汉民是当年村书记刘汉宗的弟弟，而

我就在书记家搭伙的，竟没有印象。原来汉民当时还在文安驿上中学，我不记得他却记得，通过电话，我们很快就联系上了。

老伴不放心我一个人走，要陪我一起来。我确实也自 1958 年回西安后，60 年来再没有来过陕北。知道陕北发展很快，农村也富裕了，但亲眼一看，想不到变化竟这么大，许多人家比西安还好，生活条件至少比我家好得多。2018 年 11 月 15 日，我们从西安趁火车，8 点半出发，12 点半到延安，换汽车，下午 2 点就被拉到白家塬村委会了。记不得 60 年前是怎样上塬的，只记得经过永坪镇，有一段路是在晚上走的，还下着大雨，路泥泞，听得路旁溪水潺潺。大家又饥又冷，女同学手挽着手，几乎肩并着肩，实在走不动了。天快亮时到达一个地方，顾不着吃点东西，倒下就睡着了。当时上塬没有马路，也没有马车，肯定是用十一号汽车（双脚）了。现在汽车盘山而上，塬上也村村通柏油马路。当时村里没有专用的办公窑洞，眼前的村委会已是个大院子，三面是三排平房，一边停着两辆小轿车，一问，都是私家车。白家塬这个行政村包括四个自然村，另三个是樊家塬、侯家塬和周树塬，村委会在地据中心的白家塬，现在有五六位村干部在办公，除一位下派的驻村干部外，国家每月也发津贴 2300 元。



樊书记他们带我俩先到近处的白凤乐家。他已 88 岁高龄，但很老健，一见面就说，他还记得当年在他村锻炼的三位同学，只有我是浙江人，老实，成分不好，受欺负。我不知道他说的老实指的是什么，也记不得受了哪些欺负。却记得，是有一次，带队老师来白家塬开会，会上肯定我的进步。党员同学牛尔卓也举例说，比如扫地，我要向里扫，扫到连炕灶灶头，他俩要向外扫，实际上老乡也向内扫，说明我是对的。白凤乐家是个大家庭，没有分家，子女成群，5年前的全家福照片上就有四十多人。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，不放心他一人在家，特地雇了一位保姆照顾他。这保姆就是樊书记的爱人张金叶。想不到她竟还管着他家的无线网，我的手机要上网，只有请教她。虽然有了保姆，子女们还要轮流来家里照顾他。今天是在石油钻采处工作的三儿子白德录在家，保姆在餐厅安排我们吃过饭后，他带我们参观约有



十几个窑洞的展室。原来这里还是《高凤莲艺术馆》。高凤莲是他妈，1936年生，去年才去世。她世界有名，应邀到美、加、德、法等国表演，许多外国人上塬访问，死后还来吊唁。她比我大一岁，17岁就嫁到白家塬，我们竟不知道她的手艺，据说到1986年才被县文化馆冯云山和中国美院教授靳之林发现。农村中有许多这类人才，改革开放后各县多有发现，可见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政策的重要。只是高凤莲不识字，不事先画稿，能剪十几张红纸拼起来的大纸，实在神奇。最近中央九频道播出的《中国女红》第一集，就有一大段她的视频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俩出门到塬上走走。我记得白家塬自然村原来只有12户人家，只有一排窑洞，可以说是同一个院子。现在窑都已塌了，不住人了，如下面右边第一张照片所示，其左边蓝色屋顶是现在的养猪场，右边是我们原来赶毛驴下山沟拖水的出口。现在家家用上自来水，毛驴也只剩一只了。全村现在已发展到20多户，家家都有独立的大院子，村庄面积大大扩大了。家家新盖的房子，大多是窑洞式的平房，有些人贪图冬暖夏凉，仍挖了新窑洞，但灶房等还是平房。住房内安了抽水马桶，房顶有太阳能热水器。除了国家铺的柏油马路，村内道路多是用竖砖铺的。因为年轻人多出外打工或下山定居，村里人很少，没见到成堆的小孩子，他们都到城镇上学去了，因为学校已集中到平川。村里各院子里，没见到小轿车，但各种摩托车和小汽车家家有，生活不比西安差。据说上世纪90年代坡地退耕还林后，基本不种粮食，改栽果树了。有些院子里堆着的玉米、高粱，应该是房前屋后或果园地边种的。现在路边也栽了绿化树木，还堆着许多果

园修剪下来的树枝。而 60 年前，黄土塬上光秃秃的，我们为了烧炕去打柴，根本没有什么柴，没有一根小灌木，而是用小撅头去挖干枯的蒿草根。塬小，能用牛犁的平地不多，犁地时，唯一的一头大骡子是归我用的。有一次出工时，我骑到骡背上，骡子发起飙来，要把我甩下来，幸好老乡及时捉住它。旁边就是高坎，如果甩下来，一定没命了。平地少，大部分是坡地，30-50 度以上，撒一把种子，大家排成一线，脸朝黄土背朝天，向前刨，就是这样广种薄收。这种生产方式已完全变了，村里也找不到以前必备的碾麦场和麦草堵了。



第二天，到刘汉民家吃饭。他说我欢喜吃肉，除了四五个其他菜外，还有一大碗猪肘子。过去，陕西老乡基本不吃菜，陕北更甚，平时只有一筷子腌菜，放在两寸大的碟子里，好像只供看的。我记得当年曾参加村长儿子的婚宴，也只有四碟小菜，一碟肉，也只有几片。

现在则与城里人一样，家家平常也要炒菜了。刘汉民还说我什么肉都吃，说我养过一只狗，就是杀了吃了。这使我想起，村里人不准我在家里烧狗肉，只得晚上在院子里烧。狗肉熟了，闻到肉香，有人还从床上爬起来吃。我记不得这是哪年哪月在哪里的事，原来就在白家塬！刘汉民还说我用柳条扎龙灯。春节，用竹篾扎龙灯，我幼时在老家干过，不记得在外地、还用柳条扎过。可能刘汉民年轻，与我一起干的，所以记得。但扎龙灯很麻烦，扎好后还要糊纸，点蜡烛，不知最后成功没有？有机会还要问问他。他从学校回来后，当了 50 年村干部，带领村民脱贫致富，曾任县人大和党代表，现在每年领 900 元津贴。（白凤乐，是 1947 年前参加革命的，据说每月有 6000 元呢。）刘汉民任职期间，曾到我们母校西农所在地——中国农科城杨凌——学习，见过牛尔卓和王仁梓。王仁梓当时是我班班长，我的浙江同乡，同一期来锻炼的。他分配在侯家塬，离白家塬只有五里地。我真是书呆子，8 个月中，竟没有去过。刘汉民几次提起他，想再见见面。刘家的院子很大，院子里更有城市里常见的木板做的大花桶。一排窑洞对着一排房子，一端以灶房餐厅相连，另一端就是院门，如下面的照片。房间很多，但四个儿子都在城镇安家，我们到达白家塬的那晚



上，他的四儿子刘卫泉一家就在塬上，等我们要休息时才驾车下山，回文安驿自己的住房。他还有一个女儿，是国棉三厂工人，家在西安，前不久也来塬上探望父母，并与我通过电话。我爱人家乡是关中彬县上千人的大村庄，一些人已定居在西安，不算稀奇。而陕北十数户的山村，也有人住在西安，真是因为社会和交通的发展，世界变小了。

在他家我还看到他们 2008 年印的家谱，解开了曾存在我心中的一些谜团。原来这个村虽有刘、白两姓，但都出自延川城东董家塬同一个祖先，这位先祖过继给刘姓后，后代又转到白家塬谋生，与原住民白家协议，一半后代要改姓白。又因为后来曾到董家塬认祖，有人恢复了董姓。中国的姓氏真复杂，白家塬不同姓，却是同一家族！这份家谱中，有亲生子女和父母都不同姓的，有一人有两个姓的。难怪姓刘的小孩管姓白的大人也叫三大四大的。现在关中也有这样的习惯，管父辈的老二老三叫二大三大，如果亲父亲排行老四，反而要叫四大。据说这是古代群婚制的遗存。另外，我记得只有我搭伙的刘支书家姓刘，现任樊书记告诉我，刘汉民是刘汉宗的堂弟时，我真不相信。刘汉宗在村里是年纪很大的，家谱记着生于 1913 年，当过副乡长，后任白家塬第一任党支书。我当时就奇怪，他年纪大，资格老，为什么生活是最苦的，不要说很少有白面馒头吃，就是小米，也是带壳磨粉的，有些难以下咽。好在我幼时在我外婆家吃红薯丝饭长大的，不在乎，换作与我一起的两位来自天水的同学，可能会有点受不了。为什么支书家那么穷呢，据说当时受过批斗，降为村支书，后来家产归还了，但粮食还是损失了。还有，我家成分不好，可能是我自己说

的，也可能是同学告诉的，反正老乡都知道。于是有一位成分不好、比我大不了几岁的青年，在他住的小土屋里对我说，难道成分不好的子女，老要被人另眼看待吗？我在浙江富阳农村务农时，也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当时真看不懂社会的发展前途，不能回答。我也记不得了他的名字，但看到那全村唯一的只可铺张床的小土屋，还在塌窑前的院子里。北方雨水少，黄土立性好，60年了，以后不住人，也一定无人管理，还依然屹立不倒。我指着这小屋问起这位背着成分包伏的青年，他们说那是白凤鸣家的，白凤鸣的孙子白兴亮现在已当村长了。家谱上写的清楚，白凤鸣有两个儿子，长子白志德，比我大四岁，应该是村长的亲父亲。他的问题，也是我们所有当时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问题，自然永远解决了。实际上，当时就不可能解决，不要说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，就是封建阶级统治下的改朝换代，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一两代以内，也不会完全“看表现的”。我们真应该珍惜今天这个好时代。

我本来计划，星期六到白家塬，星期天呆一天，星期一参观梁家河后，回家时顺便参观一下延安、南泥湾和壶口，准备星期二到家，因为家中有两个外孙要照看，我们离家后，是女儿请了两天假看孩子的。可惜第二天一清早，我爱人的脚崴了，只得放弃这些打算，只要再看一下白家塬的果园和梁家河，就回家。村干部说，这一切都会由他们安排好，直到送我们上了到延安的车。原来，要参观梁家河，必须下山，从文安驿走到梁家河河口，再趁旅游车进去的。实际上白家塬和梁家河是紧邻，他们马上跟梁家河联系，准备看了果园后就下沟，

可以直接进梁家河腹地。同时招呼老乡们到村委会来与我们合影，



一些老乡来时还带小米、芝麻，黄花菜、苹果等送给我（苹果上都贴着写有《梁家河》三字的透明塑料纸，撕了它，果皮上已有清晰的这三个字）。他们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人，与我打招呼，说记得我，我却都记不得一个名字，惭愧。

拍好照后，刘汉民的小儿子刘卫泉已把他的车开上来了，他与村长白兴亮和白德录一起送我们下山。经过白家塬果园，停车仔细看





了看。首先注意到离地面高 2 米处都有卷着的防雹网，据说夏天都要展开盖住整个果园。果园地面上都铺着浇水管，旁边还有大水池里，存放抽上来灌溉用水。汽车继续下山，经过周树源的大核桃树，再下山一点，就进入梁家河的塬地了。他们先带我们到习近平种的一颗苹果树前，这树旁边的平房墙上订有木牌，上写着《梁家河智慧型肥水一体化示范工程》。再往下就到了梁家河沟底。沟很小，据梁家河老



乡告诉我，这条沟长约 8 里，前后共有 5 个自然村，我们下来的地方大概在中后部。现在是旅游淡季，游人很少，我只看到两三个每簇不到 10 人的人群。当地老乡也很少，我们碰到的一位女老乡说，夏天人挤人，很多，当地人几乎都成了讲解员。她本人也是导游，在她指点下，我们看了所有三处当年知青的居住地。最后，送我们的三位老乡，都钻进旅游商店，要为我们选礼品。旅游商店的东西都很贵，这



里的东西，西安有，我们家里也有，不让他们买。但是硬是要买了上千元礼品，装了一个大纸箱，按我名片上的地址，发到西安去了。我来前也曾考虑买点礼品。开始准备买电子钟，因为习近平回梁家河时，也是给老乡每户送电子钟的。但我女儿说，“送钟”与“送终”同音，不好，以后改为有大屏幕时间显示的调频收音机，一家一个，共 24 个，也不上千元。这款收音机本来很好，但没料到，在陕北调频信号太弱，收不到，真扫兴。

汽车开出梁家河河口，就是文安驿。文安驿是古镇，但我以前没有一点印象，只记得这个地名。现在看到有一些排楼，大概都是近年建的，我也无心游览。有许多小吃店，但现在是淡季，很少开门。他们找了一家，让我们吃了饭，拦上班车，一个钟头就到延安了。我们也没到火车站，从班车上下来，就有小车拉我们上大巴，晚 10 点前

就到家了。

这次真出乎意外，只花了两天时间，访问了 60 年来惦念着的白家源，与还健在的老朋友见了面，又交了许多年轻的新朋友，建立了新联系，特别看到他们的生活很好，农村发展飞快，真叫人高兴。遗憾的是，没有看到新延安、南泥湾和壶口。延安，1956 年入西农时，学校组织我们参观过，进过杨家岭的大礼堂，钻过毛主席窑洞后的防空洞，这次看到高楼林立，我想与其他城市差不多的，不游也没大关系。只是后两处过去没有去过，很可惜。以后一定要再去几次，下次不要在冬天，挑个夏天再去吧。

可能是年纪大了，啰嗦，不管好坏对错，写了这么多。我自己是希望，不要有顾虑，能随心所欲地写，比较真切。但这就可能有不妥的地方，尤其有错误的地方，请务必指正，特别请白家源老乡指教。

2019.1.14